

中国书法全史

河北卷

赵生泉 著

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CALLIGRAPHY PUBLISHING & MEDIA

书法出版社

中国书法全史

河北卷

赵生泉 著



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CALLIGRAPHY PUBLISHING & M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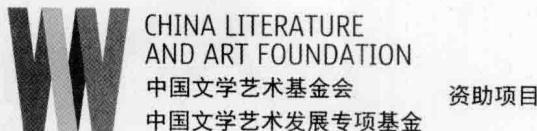
书 法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法全史·河北卷 / 赵生泉著. — 北京 : 书
法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72-0253-0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汉字—书法史—河北省
IV. ①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3018号



书 名：中国书法全史·河北卷
著 者：赵生泉
策划编辑：潘爱平 郝永伟
责任编辑：郝永伟 乔柏梁 连江州
责任印制：张金瑞
装帧设计：李佳宇
出版发行：书法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6428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2
插 页：2
字 数：34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中国书法全史》编委会

主 编：赵长青 李世俊

副 主 编：王利明 连江州 朱培尔 郭志鸿 王登科
潘爱平 杨淑萍

执行主编：潘爱平 杨淑萍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波 万晓咏 王海勇 王 理 刘清海
刘若然 乔柏梁 李 慧 杨 超 张 宁
张 蕊 张金瑞 张瀚文 陈亚男 周露露
郝永伟 饶建宁 赵 阳 贾 楠 崔晓华
黄诗洋 隋政航 臧蔚彤 樊碧博

总序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颐养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精神趣味，并且在全人类的文化殿堂里也有其高雅地位。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标志，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洪流中，她具有独特的魅力。进而而言之，自觉履践书写之道与浸染着传统文化的为人之道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人的本质，决定了个体不能脱离群体，因为其需要群体“承认”带来的安全感和成就感。众多的个体一旦聚集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维系群体运转的种种规则。而最终决定这些规则的属性、运转方式乃至群体特性的，则是“文化”，特别是承载着国学气脉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文化基于个体，成于群体，同时又会对群体之共同特征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制约。这种制约力量之强大，甚至文化的基础——个体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没有理由不影响书法。很多人信为圭臬的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说，其内在的逻辑，或许正在于此。

《礼记·王制》明确指出不同地方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其文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既然风俗、习惯、语言等均有不同，想要建立起跨越这些差异的联系，就必须尝试某种“沟通”。所以，“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仔细品味，这段话虽然主要是在写“人”，但同时也把文化的地域之别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

再到后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列举山西、山东、江南、碣石北等地的物产之后，由“关中”开始，对“三河”、“邯郸”、“燕”、

“洛阳”、“齐”、“邹、鲁”，以及“鸿沟以东，芒、砀以北”的“梁、宋”地区、“淮北沛、陈、汝南、南郡”的“西楚”之地、“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的“东楚”地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的“南楚”地区、“颍川、南阳”的“夏人之居”，逐一介绍，最后总结道：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毗邻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司马迁的本意，当然是探究天下之财如何才能通达无碍，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却不得不对天下生民的地域差异做好充分的分析与描摹。尤其可贵的是，尽管未曾经过现代科学背景的熏陶，他的文字仍然饱含着对地域文化的界定、剖析与认可，特别是对人与地域之间存在某种似乎很神秘同时又非常密切联系的肯定。

到了唐初，魏徵等人负责纂修《隋书》，在涉及文化的《儒林传序》中指出：“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其要点在于一方面指出南北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强调其内在的统一，并呼吁构建“尽善尽美”的新的文化格局。总之，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中，无论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古人们对文化、地域间的密切关联几乎都有深切的体悟。因此，袁昂才在《古今书评》中频频以地域色彩明显的意象评价书法，如以“河、洛间少年”评王献之，以“南冈士大夫”评徐淮南，以“新亭伧父”评庾肩吾，以“吴兴小儿”评陶隐居，以“高丽使人”评殷钩，以“深山道士”评袁崧，以“上林春花”评萧子云……循此而下，孙过庭《书谱序》称：“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不仅写出了对二王书风的追慕，更将书法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甚至清代的碑学，也是在披上了地域意味浓重的“南”“北”外衣后，才风靡天下的。由此不难想见这一作风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也不

难想见传统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中国书法已成静水流深、春色满园之态势。

目前已有的书法史著作，大多以朝代为基本纲目，围绕作品、书家进行风格评述。这种著述方式，虽然有直观、晓畅等优势，却难以进行深入挖掘，读来似乎不够过瘾。书法出版社成立伊始，推出的这套《中国书法全史》，是以地域文化为研究视域，将书法作为该地域历史文化的喻体生命来对话，尽量避开单向度地引述那些学究气的发掘和观点，从宣纸笔墨、字帖碑刻间找寻历史的真言。附带强调一下，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划是古代历史文化区的延续，以其作为构建表述中国书法史的基本依据，不仅是新颖的，而且是可行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将当下不断发展的书法艺术推向繁荣与深入，能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中国书法史”的生命脉络，亦希望这套丛书的面世能成为敲响书法史、文化史和出版史有机结合并真正从纸面走向鲜活的开场锣鼓。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方家与大众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书法全史》编委会

2014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时期 / 1

- 第一节 蒙昧而热烈的商代书法 / 2
- 第二节 走向规范的西周书法 / 10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异形”与个性 / 19
- 第四节 书法交流 / 35

第二章 秦汉时期 / 43

- 第一节 秦代河北书法检索 / 45
- 第二节 隶书的普及与成熟 / 47
- 第三节 楚风北上与装饰体汉篆 / 57
- 第四节 新书体 / 63
- 第五节 秦汉河北书家 / 67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 / 75

- 第一节 演进中的三体书 / 76
- 第二节 十六国的停滞与嬗变 / 82
- 第三节 融合南北铸新体 / 87
- 第四节 东魏北齐的“复古” / 97

第五节 书写虔诚的佛教碑铭 / 107

第六节 崔卢家法 / 117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 / 129

第一节 延续传统的隋代 / 129

第二节 唐代的新风气 / 137

第三节 唐代古体书 / 171

第四节 唐代河北书论 / 185

第五节 河北隋唐书家 / 187

第五章 辽宋金元时期（上） / 205

第一节 概述 / 205

第二节 法唐——以颜为主 / 206

第三节 追晋——从《集王圣教序》到《定武兰亭》 / 212

第四节 北宋新风 / 217

第五节 辽代书法 / 230

第六章 辽宋金元时期（下） / 249

第六节 金代书法 / 250

第七节 京体书风 / 267

第八节 赵体书风在河北 / 276

第九节 鲜于枢与康里巎巎 / 284

第七章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 / 291

第一节 明代的帖学 / 292

第二节 明代河北书家 / 299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河北帖学 / 303

第四节 深受张裕钊影响的河北碑派书法 / 312

第五节 馆阁遗响 / 316

目 录

第八章 清代直隶的金石书法之学 / 327

第一节 直隶私家收藏与刻帖 / 327

第二节 直隶金石学的发展 / 333

第三节 纪昀的文具收藏 / 339

第一章

先秦时期

因年代久远，探寻先秦河北书法的真实面貌，必须借助于考古发现。

先秦时期的河北书法，与商、周历史难以截然分开。《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称：“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孟门位于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西北 23 公里处的黄河之滨，是黄河突破黄土高原的东西向山脉封锁南流的关键；^[1] 太行指分隔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的太行山脉，常山即古恒山，在今河北中部唐县、曲阳一带；大河则指黄河。据此，河北中南部为殷商直辖地域。与此同时，以今北京、天津为核心的河北北部，是商重臣箕子的封地，也是商人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屏障。

商代末期，西部的周人逐渐兴起，加之帝辛（纣王）统治残暴，商朝统治阶级内部离心离德，人心涣散，同时主力部队又东征夷方，内部空虚。趁此良机，周武王出兵伐商，帝辛在牧野（今河南汲县北）兵败，自焚于鹿台之上，商王朝灭亡，约在公元前 1046 年或公元前 1044 年。^[2] 在这云谲波诡的时代变化中，河北始终站在商朝一边，即使灭商之后，周王朝对包括河北在内的殷商核心统治区的控制也非常薄弱。为迅速安定

局势，周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首先，分化商遗民，拉拢安抚，如“封箕子于朝鲜”，即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而不以臣下视之；武力镇压，如果断平息爆发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武庚叛乱。其次，众建诸侯，以收藩屏之效，如把商的畿辅地区分为邶、庸、卫三国，分封近支宗室，以北地区则封给燕国和邢国。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些政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西周晚期，王室中衰，地方诸侯乘势兴起。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河北地区成为戎狄部族与华夏民族杂处争雄之地。在此过程中，戎狄部族先后建立起肥、鼓、中山等国，而立国悠久的邢国却趋于衰亡。至于燕国，因措施得当，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渐强大，和后起的赵国一起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

第一 节

蒙昧而热烈的商代书法

《荀子·成相》云：“契玄王，生昭阳，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世本》又云：“契居番……昭明居砥石。”番之地望不详，砥石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白岔山。^[3]《史记》卷三《殷本纪》又称自始祖契至建国之主汤，商人凡八迁，自汤至盘庚又五迁，直到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始不再迁都，可见商人具有极强的游牧传统，而且总体上是自北向南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河北平原就成为商人南下的必经之路。而一旦定都于殷，河北便因地缘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畿辅之地。

晚清以来，河北境内出土的商代遗物颇多，且不乏带铭精品，如易县三句兵等。建国以后，历年所出带铭铜器更有49件之多。^[4]此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出土了79件带有文字刻画符号的陶片。^[5]这些带铭铜器及刻字陶片，从临近殷的冀南地区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直达冀东北燕山脚下的

丰宁、兴隆、迁安等县，虽愈北愈稀，却不绝如缕，充分显示了商王朝对于河北地区的重视与控制程度。

从书法角度来看，这些作品以及较早出土的《大祖诸父戈》等，大体代表着商代书法的四种类型：

1. 原始刻画符号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最早发掘于1973年，当时发现了12片带有文字刻画符号的陶器残片，^[6]随着后续发掘的进行，此类陶片增至79片。这些文字符号大都单独存在，但结合甲骨文，基本可以释读。其类型大体包括（图1-1）：1.数字“一”至“九”及“乙”、“巳”等干支符号；2.具体事物如“鱼”、“止（趾）”，应系族名或人名；3.较为抽象的概念，如“大”、“臣”、“贯雀”。根据地层关系，这些陶文的年代早于殷墟文字，故专家认为它代表了“殷墟文字的前行阶段”。^[7]

除数字及干支符号外，这些陶文大都保留有较强的象形、仿形特征。为突出物象，某些符号如“止”甚至可能使用了复刀剔底的手法，以致书写性不是很强，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对于形象的摹画。即使偶有酣畅之作，线条亦因雕琢而呈圆转之势，笔顺交待和笔势感觉不是很突出。不过，从这些简单的形象与线条当中，还是能够体会到古人对文字之美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与表现的。

2. 象形装饰文字

商人的宗教和祭祀活动极其兴盛，祭祀对象、形式也非常复杂，所以文字注定要被商人视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之一，并极力赋予其宗教色彩。考虑到当时文字的发展水平，承担这一使命的主要是既富象形特征，又须着意修饰的族徽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北发现的49件商代铜器铭文，绝大多数是族徽符号，且字数较少，只1字或2字者便有37件之多。这些铭文的书法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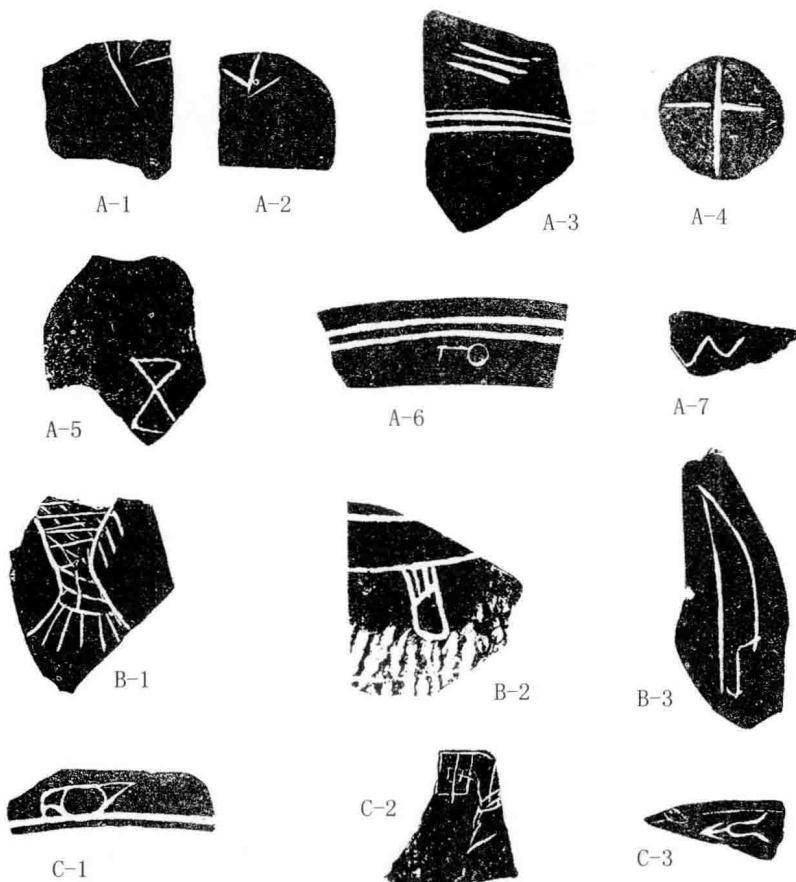


图1-1藁城台西商代陶文符号

A-1、2，九；A-3，三；A-4，七；A-5，五；A-6，巳；A-7，乙。
B-1，鱼；B-2，止（趾）；B-3，刀。C-1，臣；C-2，贯雀；C-3，大。

化内涵相当丰富。综合艺术、社会、文化等因素，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1）单字族徽

这类作品（图1-2）数量较多，有“”簋、“”爵与觚、“”或“”爵、“”鼎、“”簋、“”鼎、“”爵等。这些族徽铭文基本都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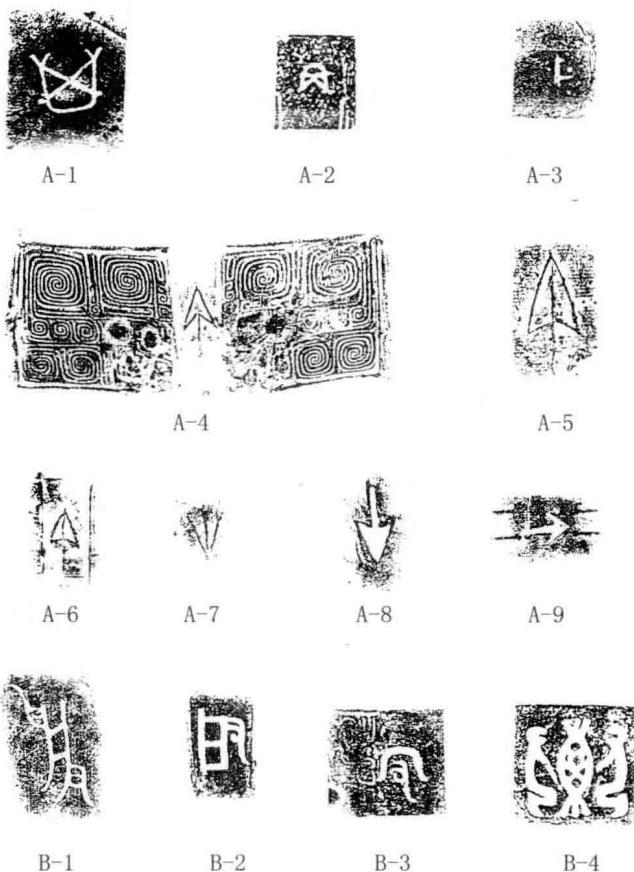


图1-2单字族徽

A、B分别表示象形、会意。A-1, 其(箕); A-2, 𠂇; A-3, 卌;
A-4、5、6、7, 𩫔; A-8、9, 𩫔。B-1, 受; B-2, 启; B-3, 守; B-4, 𩫔。

接表现物象或概念的字形，构造比较简单，表明它们所代表的氏族大都比较古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氏族的弱小或衰落，如“𠂇”的不同方向，很可能就代表着同一氏族的不同支系。

(2) 合成族徽

这类作品（图1-3）以外饰“亚”形方框的单字或多字铭文为主，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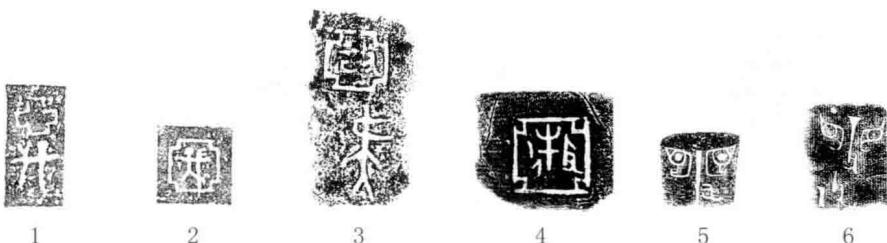


图1-3合成族徽
1、2，亚伐；3，亚父乙；4，亚微；5，𢵩；6，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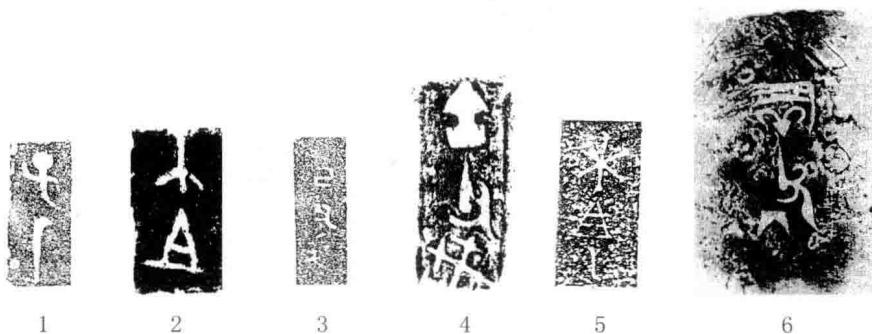


图1-4带有族徽的祖名铭文
1，子刀爵；2，木祖；3，己父毛；4，匱父癸；5，*祖乙；6，宁羊父丙。

括“亚父乙”觚、“亚口雀口父口癸”爵、“亚伐”卣、“亚微”鼎等。据研究，“亚”商代是一武职官名，其内或其周围所加文字为族徽，表明其族为王室军队。^[8]“亚父”族徽直到西周还在燕国墓葬中出土，足见其实力之强及绵延之久。

此外，定州出土的“𢵩”字亦属合成族徽，在两只威严神秘的眼睛注视下，一只手将一根木杖高高举起，似乎表示着商人对于神鬼的尊奉，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有别于众人的矜持。带有“𢵩”的器物传世颇多，但不详其地望，据此可知必出定州。

又，《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三有“孤竹”铭文。考孤竹为商代方国，在约今近冀东北至辽西一带，则其器应属商代。

(3) 带有族徽的祖名铭文

这类作品(图1-4)文字在2字以上,最多4字,如“心守”壺、“己父毛”觯、“丁止”爵、“子刀”爵、“子父乙”爵、“父癸”爵、“木祖”爵、“*祖乙”器盖等。这些铭文意义凝练,显然不是为具体纪念某事而作,应该是为祭祀祖先而作的宗庙重器。换句话说,它们在徽标意义之外,还带有某种宗教色彩,故其书亦颇恭谨,而这也是族徽类作品的共同特色。

3. 祭祀谱牒暨纪事铭文

祭祀铭文首先要有祭祀对象,其次还要有祭祀形式。如果更完善一些,还应包括时间、地点及参加人员等。在商代,受条件限制,很多铭文只包括对象和形式。如《膚册觚铭》作“膚册”、《祖丁鼎铭》作“月嘒祖丁”、《口彝铭》作“口乍口尊彝”、《父丁卣铭》(图1-5)作“口(乍父丁宝尊彝”等。前二器,一为册祭膚而作,一为月祭祖丁而作,宗教色彩较

浓;后两件虽未明确具体用途,但记录了作器者及受器者之名,显然也是祭祀祖先之器。能够当此重器者,绝非寻常人士。

由于制作时相对从容,这些铭文显然比前面提到的陶器刻画符号注重线条质量与结构安排,因而艺术性更强一些。但是,经过铸造、修磨而成的铜器铭文在获得美感的同时,势必要丧失一些甚至全部书写韵律,因而它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和传达出书写之美,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著名的商三句兵(图1-6),即大祖诸父(大且日已)、祖诸父(且日乙)、诸兄(大兄日乙)三戈,传清末出土于直隶易州张家窪(一说保定附近),《三代吉金文存》



图1-5《父丁卣铭》